

这部讲义，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为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7. 10

ISBN 978 - 7 - 80222 - 474 - 2

I. 中… II. 梁… III. 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0125 号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著 者/梁启超

出 版 人/方 鸣

责任编辑/郭岭松

封面设计/耀 午

版式设计/刘常归

责任校对/钱志刚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 × 1092 毫米 1/16 开 印张/18.75 字数/280 千字

印 刷/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222 - 474 - 2/K · 24

定 价/32.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邮编:100029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目 录

一	反动与先驱	1
二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上)	9
三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	15
四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下)	21
	近三百年学术史附表	26
五	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黄梨洲 附:孙夏峰 李二曲 余姚王学家 李穆堂	33
六	清代经学之建设 ——顾亭林 阎百诗 附:胡朏明 万充宗	43
七	两畸儒——王船山 朱舜水	61
八	清初史学之建设——万季野 全谢山 附:初期史学家及地理学家	70
九	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张杨园 陆桴亭 陆稼书 王白田 附:其他	80
十	实践实用主义——颜习斋 李恕谷 附:王昆绳 程绵庄 恽皋闻 戴子高	88
十一	科学之曙光 ——王寅旭 梅定九 陈资斋 附:其他	114
十二	清初学海波澜余录	123
十三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 ——经学 小学及音韵学	145
十四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二) ——校注古籍 辨伪书 辑佚书	184

十五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	
	——史学 方志学 地理学及谱牒学	222
十六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四)	
	——历算学及其他科学 乐曲学	273

一 反动与先驱

这部讲义，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为什么题目不叫做清代学术呢？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史》。

今年是公历 1923 年。上溯三百年前至 1623 年，为明天启三年，这部讲义就从那时候讲起。若稍为概括一点，也可以说是 17、18、19 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

我三年前曾做过一部《清代学术概论》。那部书的范围和这部讲义差不多，但材料和组织很有些不同。希望诸君预备一部当参考。

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

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

无论何方面之学术，都有这样趋势。可惜客观考察多半仍限于纸片上事物，所以它的效用尚未能尽量发挥。此外还有一个支流是：

排斥理论，提倡实践。

这个支流屡起屡伏，始终未能很占势力。总而言之，这三百年学术界所指向的路，我认为还是不错的——是对于从前很有特色而且有进步的，只可惜全部精神未能贯彻。以后凭籍这点成绩扩充蜕变，再开出一个更切实更伟大的时代，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这回演讲的微意。

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本讲义所讲的时代，是从它前头的时代反动出来。前头的时代，可以把宋元明三朝总括为一个单位——公历 1000 至 1600——那个时代有一种新学术系统出现，名曰“道学”。那六百年间，便是“道学”自发生成长以至衰落的全时期。那时代的道学思潮又为什么能产生能成立呢？（一）因为再前一个时代便是六朝隋唐，

物质上文化发达得很灿烂,建筑、文学、美术、音乐等等都呈现历史以来最活泼的状况。后来,这种文明烂熟的结果,养成社会种种惰气。自唐天宝间两京陷落,过去的物质文明已交末运,跟着晚唐藩镇和五代一百多年的纷乱,人心愈发厌倦,所以入到宋朝,便喜欢回到内生活的追求,向严肃朴素一路走去。(二)隋唐以来,印度佛教各派教理尽量输入,思想界已经搀入许多新成份,但始终儒自儒、佛自佛,采一种不相闻问的态度。到了中晚唐,两派接触的程度日渐增加,一方面有韩愈一流人据儒排佛,一方面有梁肃、李翱一流人援佛入儒。(注一)到了两宋,当然会产出儒佛结婚的新学派。加以那时候的佛家,各派都衰,禅宗独盛。禅宗是打破佛家许多形式和理论,专用内观工夫,越发与当时新建设之道学相接近,所以道学和禅宗,可以说是宋元明思想全部的代表。

(注一)梁肃与白居易交好,是天台宗一员,护法健将。李翱是韩愈朋友,著有《复性书》,拿佛理解释儒书。

道学派别,虽然不少,但有一共同之点,是想把儒家言建设在形而上学——即玄学的基础之上。原来儒家开宗的孔子不大喜欢说什么“性与天道”,只是想从日用行为极平实处陶养成理想的人格。但到了佛法输入以后,一半由儒家的自卫,一半由时代人心的要求,总觉得把孔门学说找补些玄学的作料才能满足。于是从“七十子后学者所记”的《礼记》里头抬出《大学》、《中庸》两篇出来,再加上含有神秘性的《易经》作为根据,来和印度思想对抗。“道学”最主要的精神实在于此。所以在“道学”总旗帜底下,虽然有吕伯恭、朱晦庵、陈龙川各派,不专以谈玄为主,然而大势所趋,总是倾向到明心见性一路,结果自然要象陆子静、王阳明的讲法,才能彻底地成一片段。所以到明的中叶,姚江(王阳明)学派,奄袭全国,和佛门的禅宗,混为一家。这是距今三百五六十多年前学术界的形势。

在本讲义所讲的时代开始之时,王阳明去世已将近百年了。(阳明卒于嘉靖八年,当公历1529年。)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学术界本身,本来就象贫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怜。王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学术象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学结束,吐很大光芒。但晚年已经四方八面受人妒嫉排挤,不得志以死。阳明死后,他的门生,

在朝者，如邹东廓守益、欧阳南野德；在野者，如钱绪山德洪、王龙溪畿、罗近溪汝芳、王心斋艮，都有绝大气魄，能把师门宗旨发挥光大，势力笼盖全国，然而反对的亦日益加增。反对派别，大略有三：其一，事功派，如张江陵居正辈，觉得他们都是书生迂阔，不切时务。其二，文学派，如王弇州世贞辈，觉得他们学问空疏，而且所讲的太干燥无味。其三，势利派，毫无宗旨，唯利是趋，依附魏忠贤一班太监，专和正人君子作对，对于讲学先生，自然疾之如仇。这三派中，除势利派应该绝对排斥外，事功、文学两派，本来都各有好处。但他们既已看不起道学派，道学派也看不起他们，由相轻变为相攻。结果这两派为势利派利用，隐然成为三角同盟以对付道学派。中间经过“议礼”、“红丸”、“挺击”、“移宫”诸大案，（注二）都是因宫廷中一种不相干的事实，小题大做，双方意见闹到不可开交。到最后二三十年间，道学派大本营，前有“东林”，后有“复社”，都是用学术团体名义，实行政党式的活动。他们对于恶势力，拼命奋斗的精神，固然十分可敬可佩，但党势渐成以后，依草附木的人日多，也不免流品很杂。总而言之，明朝所谓“士大夫社会”，以“八股先生”为土台。所有群众运动，无论什么“清流浊流”，都是八股先生最占势力。东林、复社，虽比较的多几位正人君子，然而打开天窗说亮话，其实不过王阳明这面大旗底下一群八股先生和魏忠贤那面大旗底下一群八股先生打架。何况王阳明这边的末流，也放纵得不成话，如何心隐本名梁汝元、李卓吾赞等辈，简直变成一个“花和尚”。他们提倡的“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把个人道德社会道德一切藩篱都冲破了，如何能令敌派人心服。这些话且不必多说。总之晚明政治和社会所以溃烂到那种程度，最大罪恶，自然是在那一群下流无耻的八股先生，巴结太监，鱼肉人民。我们一点不能为他们饶恕。却是和他们反对的，也不过一群上流无用的八股先生，添上几句“致知格物”的口头禅做幌子，和别人闹意见闹过不休。最高等的如颜元斋所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至矣极矣。当他们笔头上口角上吵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张献忠、李自成已经把杀人刀磨得飞快，准备着把千千万万人砍头破肚，满洲人已经把许多降将收了过去，准备着看风头检便宜货入主中原。结果几十年门户党派之争，闹到明朝亡了一齐拉倒。这便是前一期学术界最后的一幕悲剧。

(注二)欲知四大案简单情节,看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最好。

明亡以后,学者痛定思痛,对于那群阉党、强盗、降将,以及下流无耻的八股先生,罪恶滔天,不值得和他算帐了。却是对于这一群上流无用的道学先生,倒不能把他们的责任轻轻放过,李刚主说:

“……高者谈性天,撰语录;卑者疲精死神于举业,不唯圣道之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罔识,而搥管呻吟,自矜有学。……中国嚼笔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马厉兵之一日,卒之盗贼蜂起,大命遂倾,而天乃以二帝三王相传之天下授之塞外……”《恕谷集·书明刘户部墓表后》

又说:

“宋后,二氏学兴,儒者浸淫其说,静坐内视,论性谈天,与夫子之言,一一乖反,而至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授其柄于武人俗士。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觉建功立名,俱属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卒至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呜呼,谁生厉阶哉!”《恕谷集·与方灵皋书》

朱舜水说:

“明朝以时文取士。此物既为尘羹土饭,而讲道学者又迂腐不近人情。……讲正心诚意,大资非笑,于是分门标榜,遂成水火,而国家被其祸。”《舜水遗集·答林春信问》

顾亭林说: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亭林既愤慨当时学风,以为明亡实由于此,推原祸始,自然责备到阳明。他说: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有百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衍)之清谈、王介甫(安石)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守仁)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日知录》卷十八

王船山亦以为王学末流之弊，从阳明本身出来。他说：

“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刑戮之民、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事理’之狂妄。”《正蒙注·序论》
费燕峰说：

“清谈害实，始于魏晋，而固陋变中，盛于宋南北。案：费氏提倡‘实’与‘中’两义，故斥当时学派为害实变中。自汉至唐，异说亦时有，然士安学同，中实尚属。至宋而后，齐逞意见，专事口舌，……又不降心将人情物理平居处事点勘离合，说者自说，事者自事，终为两断。一段好议论，美听而已。……后儒所论，唯深山独处，乃可行之；城居郭聚，有室有家，必不能也。盖自性命之说出，而先王之三物六行亡矣。……学者所当痛心，而喜高好僻之儒，反持之而不下。无论其未尝得而空言也，果‘静极’矣，‘活泼泼地会’矣，‘坐忘’矣，‘心常在腔子里’矣，‘即物之理无不穷，本心之大无不立，而良心无不致’矣，亦止与达摩面壁、天台止观同一门庭。……何补于国？何益于家？何关于政事？何救于民生？……学术蛊坏，世道偏颇，而夷狄寇盗之祸亦相挺而起。……”《费氏遗书·弘道书》卷中

平心而论，阳明学派，在二千年学术史上，确有相当之价值，不能一笔抹杀，上文所引诸家批评，不免都有些过火之处。但末流积弊，既已如此，举国人心对于他既已由厌倦而变成憎恶，那么这种学术，如何能久存？反动之起，当然是新时代一种迫切的要求了。

大反动的成功自然在明亡清兴以后。但晚明最末之二三十年，机兆已经大露，试把各方面的趋势一一指陈。

第一，王学自身的反动。最显著的是刘蕺山宗周一派，蕺山以崇祯十七(1644)年殉难特标“证人”主义，以“慎独”为入手，对于龙溪王畿、近溪罗汝芳、心斋王艮诸人所述的王学，痛加针砭，总算是舍空谈而趋实践，把王学中谈玄的成份减了好些。但这种反动，当然只能认为旧时代的结局，不能认为新时代的开山。

第二，自然界探索的反动。晚明有两位怪人，留下两部怪书。其

一为徐霞客，名宏祖，生万历十三(1585)年，卒崇祯十三(1640)年，年56。是一位探险家，单身步行，把中国全部都游历遍了。他所著的书，名曰《霞客游记》，内中一半虽属描写风景，一半却是专研究山川脉络，于西南——云、桂、蜀、贵地理，考证极为详确。中国实际调查的地理书，当以此为第一部。(注三)其二为宋长庚，名应星，奉新人，卒年无考，丁文江推定为卒于顺治、康熙间。是一位工业科学家。他所著有两部书，一部是《画音归正》。据书名当是研究方音，可惜已佚；一部是《天工开物》，商务印书馆正在重印用科学方法研究食物、被服、用器，以及冶金、制械、丹青，珠玉之原料工作，绘图贴说，详明确明(注四)。这两部书不独一洗明人不读书的空谈，而且比清人专读书的实谈还胜几筹，真算得反动初期最有价值的作品。本条所举，虽然不过一两个人一两部书，不能认为代表时代，然而学者厌蹈空喜踏实的精神，确已渐渐表现了。

(注三)潘稼堂(耒)《徐霞客游记序》云：“霞客之游，在中州者无大过人，其奇绝者，闽粤楚蜀滇黔百蛮荒徼之区，皆往返再四。其行不从官道，……先审视山脉如何去来，水道如何分合，既得大势，然后支搜节讨。”又云：“沿溯澜沧、金沙，穷南北盘江之源，实中土人创辟之事。……向来山经地志之误，厘正无遗，……然未尝有怪迂侈大之语，欺人以所不知。”

(注四)《天工开物》自序云：“世有聪明博物者，稠人推焉。乃枣梨之花未赏，而臆度楚萍；釜鬲之范鲜经，而侈谈苕鼎。画工好图鬼魅而恶犬马，即郑侨晋华，岂足为烈哉！”丁在君(文江)《重印〈天工开物〉始末记》云：“三百年前言工业天产之书，如此其详且明者，世界之中，无与比伦。”

第三，明末有一场大公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笔特书者，曰：欧洲历算学之输入。先是马丁·路得既创新教，罗马旧教在欧洲大受打击，于是有所谓“耶稣会”者起，想从旧教内部改革振作。他的计划是要传教海外，中国及美洲实为其最主要之目的地。于是利马窦、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邓玉函、阳玛诺、罗雅谷、艾儒略、汤若望等，自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间先后入中国。中国学者如徐文定，名光启，号元扈，上海人，崇祯六(1633)年卒，今上海徐家汇即其故宅。李凉庵名之藻，仁和人。等都和他们来往，对于各种学问有精深的研究。先是所行“大统历”，循元郭守敬“授时历”之旧，错谬很多。万历末年，朱世堦、邢云路先后上疏指出他的错处，请重为厘正。天启、崇祯两朝十几年间，很拿这件事当一件大事办。经屡次辩争的结果，卒以徐文定、李

凉庵领其事，而请利、庞、熊诸客卿共同参预，卒完成历法改革之业。此外中外学者合译或分撰的书籍，不下百数十种。最著名者，如利、徐合译之《几何原本》，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无用我再为赞叹了。其余《天学初函》、《崇祯历书》中几十部书，都是我国历算学界很丰厚的遗产。又《辨学》一编，为西洋论理学输入之鼻祖。又徐文定之《农政全书》六十卷，熊三拔之《泰西水法》六卷，实农学界空前之著作。我们只要肯把当时那班人的著译书目一翻，便可以想见他们对于新知识之传播如何的努力。只要肯把那个时代的代表作品——如《几何原本》之类择一两部细读一过，便可以知道他们对于学问如何的忠实。要而言之，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中国元代时和阿拉伯文化有接触，但影响不大。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利、徐诸人影响不小。（注五）

（注五）当时治利、徐一派之学者，尚有周子愚、瞿式耜、虞淳熙、樊良枢、汪应熊、朱天经、杨廷筠、郑洪猷、冯应京、王汝淳、周炳谟、王家植、瞿汝夔、曹于汴、郑以伟、熊明遇、陈亮采、许番臣、熊士旂等人，皆尝为著译各书作序跋者。又莲池法师，亦与利玛窦往来，有书札见《辨学遗牍》中。可想见当时此派声气之广。

第四，藏书及刻书的风气渐盛。明朝人不喜读书，已成习惯，据费燕峰密所说：“《十三经注疏》除福建版外，没有第二部。”见《弘道书》卷上固陋到这程度，实令人吃惊。但是，到万历末年以后，风气渐变了。焦弱侯名兹，江宁人，万历四十八（1620）年卒。的《国史经籍志》，在目录学上就很有相当的价值。范尧卿名钦，鄞县人创立天一阁，实为现在全国——或者还是全世界——最古最大的私人图书馆。可惜这个图书馆到民国以来已成了空壳子了。毛子晋名晋，常熟人和他的儿子斧季宸，他们家的汲古阁专收藏宋元刻善本，所刻《津逮秘书》和许多单行本古籍，直到今日，还在中国读书界有很大价值。这几位都是明朝最后二三十年间人。毛斧季是清朝人他们这些事业，都可以说是当时讲学的反动。焦弱侯也是王学家健将，但他却好读书。这点反动，实在是给后来学者很有益的工具。例如黄梨洲、万九沙、全谢山都读天一阁藏书。汲古阁刻本书，流布古籍最有功，且大有益于校勘家。

第五，还有一件很可注意的现象，这种反动，不独儒学方面为然，

即佛教徒方面也甚明显。宋、元、明三朝,简直可以说除了禅宗,别无佛教。到晚明忽然出了三位大师:一莲池,名祜宏,万历四十三(1615)年卒二憨山,名德清,天启三(1623)年卒三藕益。名智旭,顺治九(1655)年卒我们试把《云栖法汇》莲池著、《梦游集》憨山著、《灵峰宗论》藕益著一读。他们反禅宗的精神,到处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提倡的是净土宗。清朝一代的佛教一直到杨仁山为止,走的都是这条路。禅净优劣,本来很难说——我也不愿意说,但禅宗末流,参话头,背公案,陈陈相因,自欺欺人,其实可厌。莲池所倡净宗,从极平实的地方立定,做极严肃的践履工夫,比之耶教各宗,很有点“清教徒”的性质,这是修持方面的反动。不惟如此,他们既感觉掉弄机锋之靠不住,自然回过头来研究学理。于是憨山注《楞伽》、《楞严》;藕益注《楞严》、《起信》、《唯识》,乃至把全藏通读,著成《阅藏知津》一书。他们的著述价值如何,且不必论,总之一返禅宗束书不观之习,回到隋唐人做佛学的途径,是显而易见了。同时钱牧斋(谦益)著了一大部《楞严蒙钞》,也是受这个潮流的影响。

以上所举五点,都是明朝煞尾二三十年间学术界所发生的新现象。虽然读黄梨洲《明儒学案》,一点看不出这些消息,然而我们认为关系极重大。后来清朝各方面的学术,都从此中孕育出来。我这部讲义,所以必把这二三十年做个“楔子”,其理由在此。

“楔子”完了,下回便入正文。

二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上)

本讲义目的,要将清学各部分稍为详细解剖一番。但部分解剖以前,像应该先提挈大势,令学者得着全部大概的印象。我现在为省事起见,将旧作《清代学术概论》头一段抄下来做个引线。原书页一至六

“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寝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凡时代思潮无不有‘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所谓运动者,非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不能分为谁主动,谁被动。其参加运动之人员,每各不相谋,各不相知。其从事运动时所任之职役,各各不同,所采之手段亦互异。于同一运动之下,往往分无数小支派,甚且相嫉视相排击。虽然,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同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此中观念之势力,初时本甚微弱,愈运动则愈扩大,久之则成为一种权威。此观念者,在其时代中,俨然现宗教之色彩,一部分人,以宣传捍卫为己任,常以极纯洁之牺牲的精神赴之;及其权威渐立,则在社会上成为一种公共之好尚,忘其所以然,而共以此为嗜。若此者,今之译语,谓之‘流行’,古之成语,则曰‘风气’。风气者,一时的信仰也。人鲜敢婴之,亦不乐婴之。其性质几比宗教矣。一思潮播为风气,则其成熟之时也。

“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

四、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启蒙期者,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也。旧思潮经全盛之后,如果之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则反动不得不起。反动者,凡以求建设新思潮也。然建设必先之以破坏。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所谓未遑者,非搁置之谓。其建设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间必已孕育,如史家所谓‘开国规模’者然。虽然,其条理未确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间错试验中,弃取未定。故此期之著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此启蒙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生’相。于是进为全盛期。破坏事业已告终,旧思潮屏息偃伏,不复能抗颜行,更无须攻击防卫以靡精力。而经前期酝酿培灌之结果,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门户堂奥次第建树,继长增高,‘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灿然矣。一世才智之士,以此为好尚,相与淬厉精进,闾冗者犹希声附和,以不获厕于其林为耻。此全盛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住’相。更进则入于蜕分期。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得取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应用之于别方面,于是派中小派出焉。而其时之环境,必有以异乎前。晚出之派,进取气较盛,易与环境顺应,故往往以附庸蔚为大国。则新衍之别派与旧传之正统派成对峙之形势,或且駸駸乎夺其席。此蜕化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异’相。过此以往,则衰落期至焉。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潜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拮据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此衰落期无可逃避之命运,当佛说所谓‘灭’相。

“吾观中外古今之所谓‘思潮’者,皆循此历程以递相流转。而有清二百余年,则其最切著之例证也。”

我说的“环境之变迁与心理之感召”,这两项要常为“一括搭”的研究。内中环境一项,包含范围很广,而政治现象,关系最大。所以我先要把这一朝政治上几个重要关目稍为提挈,而说明其影响于学

术界者何如。1644年3月19日以前,是明崇祯十七年;5月初十日之后,便变成清顺治元年了。本来一姓兴亡,在历史上算不得什么一回大事,但这回却和从前有点不同。新朝是“非我族类”的满洲,而且来得太过突兀,太过侥幸。北京、南京一年之中,唾手而得,抵抗力几等于零。这种激刺,唤起国民极痛切的自觉,而自觉的率先表现实在是学者社会。鲁王、唐王在浙、闽,永历帝在两广、云南,实际上不过几十位白面书生——如黄石斋道周、钱忠介、张苍水煌言、王完勋翌、瞿文忠式耜、陈文忠子壮、张文烈家玉……诸贤在那里发动主持。他们多半是无官守无言责之人,尽可以不管闲事,不过想替本族保持一分人格,内则隐忍迁就于悍将暴卒之间,外则与“泰山压卵”的新朝为敌。虽终归失败,究竟已把残局支撑十几年,成绩也算可观了。就这一点论,那时候的学者,虽厌恶阳明学派,我们却应该从这里头认取阳明学派的价值。因为这些学者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事业,令我们永远景仰。他们自身,却都是——也许他们自己不认——从阳明学派这位母亲的怀里哺养出来。

这些学者虽生长在阳明学派空气之下,因为时势突变,他们的思想也象蚕蛾一般,经蜕化而得一新生命。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他们许多人都是把半生涯送在悲惨困苦的政治活动中,所做学问,原想用来做新政治建设的准备,到政治完全绝望,不得已才做学者生活。他们里头,因政治活动而死去的人很多,剩下生存的也断断不肯和满洲人合作,宁可把梦想的“经世致用之学”依旧托诸空言,但求改变学风以收将来的效果。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朱舜水,便是这时候代表人物。他们的学风,都在这种环境中间发生出来。

满洲人的征服事业,初时像很容易,越下去越感困难。顺治朝十八个年头,除闽、粤、桂、滇之大部分始终奉明正朔外,其余各地扰乱,未尝停息。就文化中心之江浙等省,从清师渡江后,不断的反抗。郑延平成功、张苍水煌言会师北伐时,顺治十六年大江南北,一个月间,几乎全部恢复。到永历帝从缅甸人手上卖给吴三桂的时候,顺治帝已死去七个月了。其年正月康熙帝即位那年即顺治十八年云南荡平,郑氏也遁入台湾,征服事业,总算告一个结束。但不久又有三藩之乱,扰

攘十年，方才戡定。康熙十二年至二十一年所以满洲人虽仅用四十日工夫便奠定北京，却须用四十年工夫才得有全中国。他们在这四十年里头，对于统治中国人方针，积了好些经验。他们觉得用武力制服那降将悍卒没有多大困难，最难缠的是一班“念书人”，——尤其是少数有学问的学者。因为他们是民众的指导人，统治前途暗礁，都在他们身上。满洲政府用全副精神对付这问题，政策也因时因人而变。略举大概可分三期：

第一期，顺治元年至十年，约十年间，利用政策。

第二期，顺治十一、二年至康熙十年，约十七八年间，高压政策。

第三期，康熙十一、二年以后，怀柔政策。

第一期为睿王多尔衮摄政时代。满兵仓猝入关，一切要靠汉人为虎作伥。所以一面极力招纳降臣，一面运用明代传来的愚民工具——八股科举，年年闹什么“开科取士”，把那些热中富贵的人先行绊住。第二期，自多尔衮死去，顺治帝亲政，顺治七年政策渐变。那时除了福建、两广、云南尚有问题外，其余全国大部分，都已在实力统治之下。那群被“诱奸”过的下等“念书人”，不大用得着了。于是扳起面孔，抓着机会便给他们点苦头吃吃。其对于个人的操纵，如陈名夏、陈之遴、钱谦益、龚鼎孳那班贰臣，遭蹋得淋漓尽致。其对于全体的打击，如顺治十四年以后连年所起的科场案，把成千成万的八股先生吓得人人打噤。那时满廷最痛恨的是江浙人。因为这地方是人文渊薮，舆论的发纵指示所在，反满洲的精神到处横溢。所以自“窥江之役”即顺治十六年郑、张北伐之役以后，借“江南奏销案”名目，大大示威。被牵累者一万三千余人，缙绅之家无一获免。这是顺治十八年的事。其时康熙帝已即位，鳌拜一派执政，袭用顺治末年政策，变本加厉。他们除遭蹋那等下等念书人外，对于真正知识阶级，还兴许多文字狱，加以特别摧残。最著名的，如康熙二年湖州庄氏史案，一时名士如潘力田、恽章、吴赤泻炎等七十多人同时遭难。此外，如孙夏峰于康熙三年被告对簿，顾亭林于康熙七年在济南下狱，黄梨洲被悬购缉捕，前后四面，这类史料，若子细搜集起来，还不知多少。这种政策，徒助长汉人反抗的气焰，毫无效果。到第三期，值康熙帝亲政后数年，三藩之乱继起。康熙本人的性格，本来是阔达大度一路，当着这变乱时代，更不能不有戒心，于是一变高压手段为怀柔手段。他的